

焦点网谈 青年逃离大城市 谁之“过”?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对679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年人的买房选择已趋于多元化,41.5%的人愿意在“城市郊区”买房,仍然坚持在“中心城区”买房的人占31.8%,还有17.6%的人愿意在“所在地的周边城市”买房。(4月27日《中国青年报》)

相比“中心城区”的高房价,相当一部分中小城市无疑有着更为突出的性价比。孤立地看,青年人的选择具有一定市场理性,如果联想到年轻人“逃离京沪”现象,这些理性更带着对融入大城市的许多无奈。

到2008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45.6%,我国的城市人口已达到6.07亿,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接近66%,城市人口将达到9.15亿。贪大求全几乎是我国城市发展的通病。城市化是消除社会贫富差距的大势所趋,但囿于同质发展和规模贪大求全等问题,城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拥挤、就业困难、资源短缺等矛盾日益突出。

在割裂政绩评价体制下,城市各自为战,甚至为发展不惜与兄弟城市争得头破血流。虽然对城市发展资源差异化配置的论点多年前已提及,但到底几个城市愿意割舍唾手可得的发展机遇?而过去那些因为历史特殊时期置身于中小城市的大企业、科研院所,近年来纷纷笑纳大城市抛出的“总部经济”橄榄枝。

在以行政为主导的产业转移大局中,大城市吸进去的是优势企业,而将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这样难啃的“骨头”抛给中小城市。缺乏优势经济支撑的中小城市,虽然在生活方面有着较低的成本,但就业、医疗、消费等各个方面与大城市仍存在较大差别,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现代城市理念下,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理当更接近于平等竞争关系,这才是有效纾缓大城市工作和生存压力,提高居民幸福品质的根本所在。以这样的视角看去,眼下青年人选择在中小城市买房,更像是面对大城市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一种无奈选择,无力感显然不能成为幸福感的内容。

头条评论 魏文彪

北京为落实国务院“新国十条”的《通知》,正在研究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的相关政策,购买第二套、第三套房将从贷款和许可方面进行限制性规定。记者28日上午了解到,北京市限购多套房的新政由多部门联合制定,待市委常委会通过后统一发布,而该政策的出台时间最快有望在下周。(4月28日《法制晚报》)

陈一舟

胡琼,被吉尼斯誉为“中国铁掌第一人”和“中国金钟罩铁布衫第一人”,江湖人称“铁罗汉”。4月27日,是胡琼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当上私人保镖上班的第一天,一名姓刘的民营企业老板以月薪万元聘请他做6岁女儿的私人保镖,主要任务是保护女儿上学放学的人身安全。(4月28日《新文化报》)

富有,可以让人过上高品质的生活。但对于一些中国富人而言,拥有财富在很多时候,似乎反而成了一种负累。守着巨大财富,内心却充满浓浓的“不安全感”,这是当下很多富豪普遍性的真实心理反映。之前曾有媒体报道,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谈到富豪话题时,定义中国富豪为弱势群体。富人没有安全感,富人是弱势群体——这些话让人多少有些惊讶。但细加思量,就不难发现,这并不是富豪们在故作姿态或者有意作秀。

无可否认的是,很多富豪缺乏理性的财富观和财富伦理,把物质和金钱看得过重,以至于产生过多不必要的财富危机感和财富孤独意识。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内地富豪还在围绕着财富、事业转,远未达到‘企业家’这个境界和水平。”拥有财富的极大快感让富豪们比常人更担忧于财富的失去,极尽谨慎地保持自己的财富拥有量,狭隘的“守财富”意识让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利用财富参与社会创富、为社会谋福祉的愿望,导致个体与社会产生割裂……富人对公益责任的漠视使他们站到大多数人的对立面,而拉大的贫富差距又成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对立和疏离渐渐产生。

财富的享有得不到道义和环境的支撑,导致舆论和穷人日益“团结”起来,站在富人的对立面,带着阴暗和非理性元素的“仇富”思潮充斥于网络和坊间,让富人们感到了强烈的安全危机,陷于惶恐和愤怒交织的情绪中难以自拔——“苦闷”和“不安全感”自然会悄然滋生。正因如此,就有了通过“消费”购买安全

以问责制推动房产调控

让调控效果显现。不过与此同时又需看到的是,地方政府毕竟与房地产市场存在很大的利益关联,通过打击炒房行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地价,并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收益,这样一来也就难免会有部分地方政府在执行调控政策上“缺乏诚意”,并因此而在参与调控上表现消极,出台相对“温和”的调控细则,甚至继续变相架空国家调控政策。此前国家出台的诸多房地产调控政策所以未能取得明显实效,一定程度上即与部分地方政府在执行调控政策上态度消极有关,所以此轮房地产调控需要吸取以前调控政策遭到部分地方

镇坪无虎,“周老虎”应绝迹

国家林业局政府网登出题为“陕西镇坪及周边地区华南虎等兽类资源调查完成”的消息。消息称,经国家林业局组织专家组调查,镇坪及周边自然环境不能满足华南虎最小种群单元长期生存。(4月28日中国网) 国家林业局的官方消息具备权威性,不啻是在从科学角度,宣告镇坪地区没有野生华南虎。“周老虎”事件也将彻底终结。虽然此前很多人都清楚“周老虎”是在虚构作假,但仍然对华南虎抱有一点残存希望。毕竟野生华南虎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谁也不希望这个物种从此消失。

“周老虎”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却有人在背后操纵炒作,将一起欺诈案发酵成公共事件。而在这一事件中,各路角色轮番登场,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罗生门”,让公众看得眼花缭乱,更将全社会挟卷进去,每个人都成为可以被利用的棋子。人性的良善丑恶,也都在“周老虎”事件中被放大。某些专家学者丧失立场,追逐名利,不惜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导致严肃的科学辩论,变成黑白不清的闹剧。而地方权力翻云覆雨,置政府公信力不顾,同流合污公然造假,涂抹出苦涩难言的黑色幽默。

国家林业局花费3年时间调研考察,多次组织专家评审论证,耗费大量公共资源,才得出镇坪没有野生华南虎的结论。希望国家林业局拥有无可推翻的铁证,让意图翻案的“周老虎”们彻底死心,别再折腾不休,也别再重出江湖闹笑话了。

国家赔偿之后仍需责任追究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所造成的违法伤害,国家赔偿之后怎么办?毫无疑问,《国家赔偿法》是救济法而不是责任法。因此,其关注的重点只能是确保赔偿款到位,而不是如何追究责任。尽管如此,这也绝不意味着个人权力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只能由国家之慨。曾经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足以说明,权力拥有者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时还缺少一种有效的制约,以至于缺乏对权力足够的敬畏,而这正是侵权事件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对责任的推卸也是国家赔偿

读书记 张正隆

张正隆说,采访两年,写作半年,再送审、修改又送到出版社时,3年过去了,3年30多万字一部《战将韩先楚》,从生到死,其实就写了六个字:“痛快”、“痛苦”与“反思”。作者的期望是:透过很多人的记忆,看清韩先楚这个人,一个李云龙的传奇将军。

打下海南岛就到了台湾“唯有死者方可看到战争结束”把斗争推到海上去尽快把军队数量减下来 作者简介:张正隆,沈阳军区专业作家,已出版《雪白血红》、《血情》、《枪杆子1949》等10余部长篇报告文学。

含蓄、幽默与厚重

直白表达爱情的情歌对唱,既是村话人直率的性格所然,也是村话人特有的文化所然。男生自叹命运不好,家穷娶不到老婆,岁数大了非常烦恼。女生并不矜持,很直白地称赞男生有貌又有才,当即就把心交给男生,认定男生如果娶了自己,一世都好。其实,想要了解村话人及其文化,从村话民歌切入,无疑是一条好的路径。

其二,述史题材。村话人对本族群的历史文化很重视,他们很愿意用民歌的形式记录家史、村史,甚至是国家的大事件。如《长恨歌》等。其三,教儿育女题材。村话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子女教育,主要是文化知识和为人处事两方面的教育。这类题材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劝歌》和《劝子读书之歌》等。过去很多人一直想弄明白,村话人只有10万人左右,为

社科新著点评 刘宇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模式 ——读《市场化进程与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得到了和谐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经历了并继续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市场化改革则是这场深刻变革的最突出的内容,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方面。那么,如何评价、认识和继续探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冯虹教授的《市场化进程与建设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以其特有的开阔视野,严谨的逻辑论证和透彻的学理分析,向读者阐述着如何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彻底变革传统计划体制下统治的、权威的、权力集中的政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良治的、服务的、分权的政府。并通过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合力,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我们知道,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作者没有摒弃和回避现实的社会经济状态,去死守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而是运用经济学的视角,将自己转化为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社会学家,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现实经济问题。本书的最大亮点就是,作者提出了“和谐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说实话,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作者将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对应性的分析,认为“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要素;公平正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诚信友爱是维系市场的道德纽带;充满活力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安定有序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现代市场经济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如此话语概括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互动关系,则是作者的独特思考之所在。作者通过对世界流行的几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分析对比,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既保持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可以解决市场经济下政府角色定位的难题,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而宏观调控则是政府与市场联动的重要手段,宏观与微观、中观不能截然分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在某些时候就包含了对微观经济的调控。

中国的和谐社会构建,是政府在把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而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多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模式在中国的体现。

特色图书 刘宇

革命史图书选介 跨海之战 ——金门·海南·一江山

作者:刘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2月 金门、海南和一江山三次跨海之战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以三次战争为线索,体现国共双方在战略方针的较量与转变,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对战局的影响,结合地理、经济等因素,全面再现国共海上斗争的实力转换过程。利用国共双方的战争档案、电报、总结、将领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把国共双方放在同等地位上,摆脱过去著作的表面化、说教化的文风,以严谨、客观和学术规范的写法,实现这个题材的突破。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从渡海登陆作战的角度去研究、比较这几次作战的特点和演变;二是从国共双方斗争的全局和国际政治大背景来解释这些战争的决策、结果及其影响。

人文地理 吉君臣

坦白说,我并不是很会唱村话民歌,到了我这一代,真正会唱村话民歌的人已经不多。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编辑这样一部村话民歌精选集呢?我想,大概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我生于斯,长于斯,对村话人祖祖辈辈生长的这块土地,这种文化,以及由此这种文化创造并形成的人文风情非常热爱;其二,在我离开这块土地三十多年之后,再回到她的怀抱时,我发现,原先我所熟悉且热爱的人文风情,很多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很快消失。面对这些,我有一种痛惜之感。如何保存、挖掘和传扬村话人这种独特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我是村话人,是村话人居住的这块土地哺育成长起来的文化人,保存、挖掘和传扬村话人的文化遗产,我认为我有责任。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放下创作计划,集中精力编辑一个系列丛书,即:《东方·昌江村话民歌精选集》(东方·昌江村话人人文风情录)和《海南西部村话人名人录》。现在着手编辑的是《东方·昌江村话民歌精选集》。

海南西部村话民歌是很独特的一

读书记 张正隆

革命史图书选介 跨海之战 ——金门·海南·一江山

作者:刘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2月 金门、海南和一江山三次跨海之战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以三次战争为线索,体现国共双方在战略方针的较量与转变,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对战局的影响,结合地理、经济等因素,全面再现国共海上斗争的实力转换过程。利用国共双方的战争档案、电报、总结、将领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把国共双方放在同等地位上,摆脱过去著作的表面化、说教化的文风,以严谨、客观和学术规范的写法,实现这个题材的突破。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从渡海登陆作战的角度去研究、比较这几次作战的特点和演变;二是从国共双方斗争的全局和国际政治大背景来解释这些战争的决策、结果及其影响。

人文地理 吉君臣

坦白说,我并不是很会唱村话民歌,到了我这一代,真正会唱村话民歌的人已经不多。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编辑这样一部村话民歌精选集呢?我想,大概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我生于斯,长于斯,对村话人祖祖辈辈生长的这块土地,这种文化,以及由此这种文化创造并形成的人文风情非常热爱;其二,在我离开这块土地三十多年之后,再回到她的怀抱时,我发现,原先我所熟悉且热爱的人文风情,很多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很快消失。面对这些,我有一种痛惜之感。如何保存、挖掘和传扬村话人这种独特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我是村话人,是村话人居住的这块土地哺育成长起来的文化人,保存、挖掘和传扬村话人的文化遗产,我认为我有责任。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放下创作计划,集中精力编辑一个系列丛书,即:《东方·昌江村话民歌精选集》(东方·昌江村话人人文风情录)和《海南西部村话人名人录》。现在着手编辑的是《东方·昌江村话民歌精选集》。

海南西部村话民歌是很独特的一

镇坪无虎,“周老虎”应绝迹

国家林业局政府网登出题为“陕西镇坪及周边地区华南虎等兽类资源调查完成”的消息。消息称,经国家林业局组织专家组调查,镇坪及周边自然环境不能满足华南虎最小种群单元长期生存。(4月28日中国网) 国家林业局的官方消息具备权威性,不啻是在从科学角度,宣告镇坪地区没有野生华南虎。“周老虎”事件也将彻底终结。虽然此前很多人都清楚“周老虎”是在虚构作假,但仍然对华南虎抱有一点残存希望。毕竟野生华南虎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谁也不希望这个物种从此消失。

“周老虎”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却有人在背后操纵炒作,将一起欺诈案发酵成公共事件。而在这一事件中,各路角色轮番登场,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罗生门”,让公众看得眼花缭乱,更将全社会挟卷进去,每个人都成为可以被利用的棋子。人性的良善丑恶,也都在“周老虎”事件中被放大。某些专家学者丧失立场,追逐名利,不惜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导致严肃的科学辩论,变成黑白不清的闹剧。而地方权力翻云覆雨,置政府公信力不顾,同流合污公然造假,涂抹出苦涩难言的黑色幽默。

国家林业局花费3年时间调研考察,多次组织专家评审论证,耗费大量公共资源,才得出镇坪没有野生华南虎的结论。希望国家林业局拥有无可推翻的铁证,让意图翻案的“周老虎”们彻底死心,别再折腾不休,也别再重出江湖闹笑话了。

国家赔偿之后仍需责任追究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所造成的违法伤害,国家赔偿之后怎么办?毫无疑问,《国家赔偿法》是救济法而不是责任法。因此,其关注的重点只能是确保赔偿款到位,而不是如何追究责任。尽管如此,这也绝不意味着个人权力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只能由国家之慨。曾经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足以说明,权力拥有者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时还缺少一种有效的制约,以至于缺乏对权力足够的敬畏,而这正是侵权事件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对责任的推卸也是国家赔偿

读书记 张正隆

张正隆说,采访两年,写作半年,再送审、修改又送到出版社时,3年过去了,3年30多万字一部《战将韩先楚》,从生到死,其实就写了六个字:“痛快”、“痛苦”与“反思”。作者的期望是:透过很多人的记忆,看清韩先楚这个人,一个李云龙的传奇将军。

打下海南岛就到了台湾“唯有死者方可看到战争结束”把斗争推到海上去尽快把军队数量减下来 作者简介:张正隆,沈阳军区专业作家,已出版《雪白血红》、《血情》、《枪杆子1949》等10余部长篇报告文学。

含蓄、幽默与厚重

直白表达爱情的情歌对唱,既是村话人直率的性格所然,也是村话人特有的文化所然。男生自叹命运不好,家穷娶不到老婆,岁数大了非常烦恼。女生并不矜持,很直白地称赞男生有貌又有才,当即就把心交给男生,认定男生如果娶了自己,一世都好。其实,想要了解村话人及其文化,从村话民歌切入,无疑是一条好的路径。

其二,述史题材。村话人对本族群的历史文化很重视,他们很愿意用民歌的形式记录家史、村史,甚至是国家的大事件。如《长恨歌》等。其三,教儿育女题材。村话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子女教育,主要是文化知识和为人处事两方面的教育。这类题材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劝歌》和《劝子读书之歌》等。过去很多人一直想弄明白,村话人只有10万人左右,为

社科新著点评 刘宇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模式 ——读《市场化进程与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得到了和谐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经历了并继续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市场化改革则是这场深刻变革的最突出的内容,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方面。那么,如何评价、认识和继续探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冯虹教授的《市场化进程与建设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以其特有的开阔视野,严谨的逻辑论证和透彻的学理分析,向读者阐述着如何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彻底变革传统计划体制下统治的、权威的、权力集中的政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良治的、服务的、分权的政府。并通过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合力,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我们知道,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作者没有摒弃和回避现实的社会经济状态,去死守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而是运用经济学的视角,将自己转化为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社会学家,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现实经济问题。本书的最大亮点就是,作者提出了“和谐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说实话,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作者将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对应性的分析,认为“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要素;公平正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诚信友爱是维系市场的道德纽带;充满活力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安定有序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现代市场经济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如此话语概括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互动关系,则是作者的独特思考之所在。作者通过对世界流行的几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分析对比,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既保持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可以解决市场经济下政府角色定位的难题,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而宏观调控则是政府与市场联动的重要手段,宏观与微观、中观不能截然分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在某些时候就包含了对微观经济的调控。

中国的和谐社会构建,是政府在把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而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多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模式在中国的体现。